

散文

散文

石碾

陈爱松

晨曦刚从万安山的缺口处露出一丝信息，大红公鸡的喉咙里就冲出一声长啸——天亮了。狗吠两声后，是扫帚的唰唰声，扁担担水的吱吱声，风箱做饭的咕咚声，织布机的咯噔声……

还有一种声音，轻轻地，持续不断地响着，吱扭，吱扭，吱扭……

那是我家隔壁门前一盘石碾在工作。

圆形的大石盘，正中洞中插着根短棍，棍上系着方框，方框中固定着石碾，方框边有两个洞，插进一根长棍，推着长棍，石碾便绕着石盘转起来。谷子倒在碾盘上，男人推着，女人手拿小笤帚，把挤到碾边的谷子扫到里面去。黄澄澄的米粒出来了，便扫到簸箕里，对着墙簸起来，谷糠落了一大片。几只鸡飞快地跑到谷糠中刨几下。

上午下午，石碾也常常响起来。来的往往只有一个女人。长棍抵在她的肚子上，边推边扫碾。一个人是累点儿，可30斤白谷子碾要六毛钱，抵三天工呢。饭前也能碾好，不耽误孩子和男人回来吃晚饭。

山北的坡地，不好好长麦子，但每窝红薯都是一嘟噜一嘟噜的。有人背了一袋子干红薯片来，一边碾，一边要用筛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红薯窝头，红薯面条，红薯恰烙，红薯花卷，各种各样的主食就会变出来。

偶尔，有人挎着一篮子洗好的青辣椒来。刷了碾盘，青辣椒碾成酱，多撒几斤盐，放到罐子里，能当半年的下饭菜。

有人来推辣椒了，我会飞快地跑回家告诉奶奶。等人家走后，奶奶会端出一盆切成小块的红薯，倒在碾上，推几圈，就变成了淡绿色的红薯渣，饭时可以吃烙辣饼了。或者是把磨刷一遍，收获多半盆青绿色的水，喝成辣汤了。

这盘碾大家公用，主人是谁呢？有人说是陈姓老祖宗留下来的，有人说是麦奶家的。麦奶小脚，不多的白头发挽着一个髻，孤身一人住着一间土墙瓦屋。据说她是有儿子的，可惜长到十七八得病死了，麦奶觉得没活头上了吊。邻居全娃每天会送来一担水。有时，奶奶包了扁食，也派我端过去一碗。麦奶笑着拉拉我的手，从一个瓦罐里抓出一把枣来，放到我口袋里。

来推石碾的，常去麦奶家借簸箕一类的用具，送还时，总会送半碗米一碗红薯面什么的。有时带着用具，想起麦奶，也送点，麦奶很难为情，推着不收。后来，人们就不拿用具了，都去麦奶家借。麦奶每天起床，必定把碾道和皂角树下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麦奶后来在一个夜里去世了。女人们推着碾，还会不时地提到她，想起她的好处与可怜来。

责任制落实后，头两年，碾盘还会转转，接下来就只有孩子去陪它了。再往后有人买了麦奶的这处院子，皂角树边盖了土墙，把碾圈到了家里，石碾就被人遗忘了。再后来，这家人也搬走了，土房子，土墙壁在风雨中都化为了泥土，石碾埋在了泥土之下。

前两天回老家，站在门口，看碾盘所在的地方只是一个隆起的土堆，土堆上荒草一片，半个碾盘露在草间，似乎那一段时光不曾存在过。只有那棵黑粗的皂角树，依旧绿意盎然，风来，一地绿荫中光斑轻轻摇晃。

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一家人，可我总记得那两个儿子，高大、帅气，还有他们的眼神：坚定、忠诚和信赖。

吃还是不吃

“哎呀，我又没什么感觉，全身上下哪儿都舒坦，身体棒得很，到医院做啥子嘛？”

“你查下子嘛，天天吃红烧肉，还有得病？真有得病，让你接到（接着）吃。”

吵吵嚷嚷，从走廊传来嘈杂的人声，是纯正的四川口音，有男有女。我在办公室听着，心知准又是孝顺子女担心，听老人来体检。

果然，迎面走来一个健壮的老人，面色红润，身板挺直。后面跟着一群老少女子，带着脸盆水瓶之类，大有马上去住院的架势。老人对我爽朗地一笑，大手往身后那群女子方向挥了挥，直接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是中建三局退休的，你们医院大楼就是我们单位修的。都是我屋里头的，非说我好病，要我住院检查。我身体好得很，能吃能喝，你跟她们说下，我不住院。”我笑

了起来，这可从哪说起。

还没等我开口，后面那帮女人都开了腔：“你还有得病？都查出来了，血压高，血糖高，血脂高，你就是三高。非要等到像老孙头那样心肌梗死，直接到了送火葬场才算有病？”边说边拿出一份体检报告递给我。

我明白了，老孙头准是老人的邻居朋友，孩子们怕老人重蹈覆辙。这种事常见，看病也是有扎堆效应的，一个女同志查出甲状腺瘤，全单位几百个女同志一星期内都会去检查甲状腺。

看了看体检报告，还真有问题，血压血糖都高，尤其血脂高得离谱，估计抽出来的是脂肪血。我一指出来给老人看，劝他：“就当为孩子们着想，你要真病了也辛苦他们。再彻底检查下吧，没发现问题活得更踏实些？想吃啥就吃啥。”老人得意地笑：“我最爱吃红烧肉，每天熬一大碗，硬是好吃得很。”我被他说得都馋了起来，一拍桌子，说：“行，你查了没问题，我陪你吃红烧肉。”

就这样，老人住了进来。

那群女子背着老人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们讲他不听，你多劝劝他，别吃红烧肉。他还喝酒！也得戒。他听你们医生的。”我点头应了。

一个病房，三位年纪相仿的老人，那两个都是发了心脏病，等着做冠脉造影检查的。三人一见如故，聊得不亦乐乎，最晚进来的这位老人年纪最大，为老哥。

我夜查房时，老人跟我说，要像他俩一样做冠脉造影检查，彻底排除心脏病。我奇怪，怎么老人转变得这么快？一般检查还没出结果呢，造影检查还不见得要呢。

只听三位老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互相调侃起来。原来那两位老人也是平时身体挺好，还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肥肉，结果发了心脏病，此时双双都说：老哥你得意地笑：“我最爱吃红烧肉，每天熬一大碗，硬是好吃得很。”我被他说得都馋了起来，一拍桌子，说：“行，你查了没问题，我陪你吃红烧肉。”

一般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患了高血压病、高血脂症，糖尿

诗意的失落

吴文玺

汤。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，哪怕被尊称为“诗圣”“诗仙”，骨子里依旧是一个血肉丰满五味杂陈的人，会空虚，会寂寞，会惆怅，会愤怒，也会六神无主，也会发呆发愣甚至么么哒。

诗人的生活不等同于诗意的生活，诗人不一定就一定要过着诗意的生活，即使“诗圣”“诗仙”的生活也充满了郁郁不得志，充满了艰辛与坎坷。但是他们却能在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，非常诗意地生活着。在艰辛的生活中找到诗意并诗意地生活着本身就是诗意，至少，诗意成就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在生命的路上，他们撒下一粒粒离愁别绪的种子，用一滴滴春光秋阴般的诗雨浇灌出一片杨柳岸晓风残月，演绎出一幕幕良辰美景。

诗意是一种美，只要生活在，诗意就会在。诗意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激情的抒发和流露，是一种忘乎困顿忘乎痛苦忘乎一切的精神层面的崇高境界。诗意也是一种共鸣，这种共鸣只可意会，无法具象，无法替代，共鸣的体悟也无法传导及他人，如芒在背，如鲠在喉，所有的感知只有自己知道。诗意相对于物质化的世界，是一种超越存在的精神符号。

诗意的产生源自于诗意的环境，没有环境对诗意的启发，就不会有诗意的共鸣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”“沈廖明月夜，淡泊早秋天”，看上去是有字的诗，悟出来却是无形的画，走进去却又是灵魂的牵绊。无论诗人描摹的是山林丘壑还是切肤感受，他们最先的前提，不是物象是否得真，而是意象是否高雅。这种意象大一统下的物象，又与他们的诗情相结

合，成为他们终生孜孜追求的精神体悟。物象只是表层，字里行间以及字里行间背后衍生出的种种意念、幻相和联想才是诗意。在这种创作思想支配下，物象的取舍，去留，离合，粗疏还是工致，一直是他们苦苦琢磨的内容。他们的作品，自标新义，自铸伟辞，自成瑰宝，自是大雅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是他们灵魂、人格、才情和学养的诗意的升华。

诗意具有高深的文化底蕴和精到的思想蕴涵。譬如一根草。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”“四顾何茫茫，东风摇百草”“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”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”。这种“草”已经不是“草”，而是一种文学积淀，是一种心灵感应，这种诗意的“草”早已超乎现实存在，升华为承载着思乡、怀旧、悲物悯人情意义上的一种形而上。

诗意的写草，把一池苍苍的芦苇写出许许多多的诗意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大师们的解释，没有开花的芦苇谓之“蒹”，刚刚发出嫩芽的芦苇谓之“葭”。已经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过芦苇了，蒹葭苍苍的物象遥远得比《诗经》还要遥远。芦苇一片一片地凋敝，一方之水一方一方地干涸，伊人不再，下海的下海，蛰居的蛰居，傍人的傍人。

于是我们开始质疑牺牲诗意换来的繁华，其性价比到底有多合理或者到底有多不合理。繁华之后，诗意不应该只是沉淀在书本里的回忆。我们迫切需要诗意的复归，需要在繁花喧嚣的红尘中继续诗意地栖居。

新书架

《孤独小说家》

王敏

小说家青田耕平和儿子小驰生活在一起。耕平出道十年，寂寂无名，他的作品从来没有加印。另一方面，三年前，耕平的妻子因为不可思议的交通事故去世。“那真的是事故吗”，深深困扰着他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笔耕不辍，坚守梦想。

最黑暗、最绝望的时候，正是你离梦想最近的时候。

你只需要再站起来一次。

石田衣良，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第129届直木奖得主。在日本文坛，他是与司马辽太郎、宫部美雪、东野圭吾比肩的中坚作家。

文史杂谈

中州翰林——顾璜

裴元秀

顾璜到北京参加会试，考中二甲第三名进士，再经朝考，成绩优秀，成庶吉士（又称庶常），开始了在翰林院的学习生活。当他以庶常的身份去拜见晚清重臣翁同龢时，翁同龢称赞他是“美材”。

《翁同龢日记》中有如下记载：“新庶常顾璜来见，才19岁，美材也”。光绪五年，顾璜在翰林院学习结业，到户部任职。户部是古代的官署，六部之一，是管理全国赋役户籍的机关。最初，顾璜在户部的广东司工作。不久，顾璜又“奉旨记名以军机章京用。”顾璜以户部小官的身份“兼任”军机章京时，工作出色，使他在户部的职位不断上升。后来，他位列六部九卿。

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《光绪朝上谕档》的记载，光绪十一年，兼任军机章京的顾璜，是户部的候补主事，次年就成为户部主事。不久，数位军机大臣联名上奏，说顾璜在军机处缮修汉字档案时，担任总校，工作“颇为谨慎”，平日在军机处的工作又“奋勉”，使顾璜从户部主事升为户部即补员外郎。“即补”，是指遇缺时补缺提升。顾璜等了一年多，在光绪十四年遇到了缺额，便升为户部员外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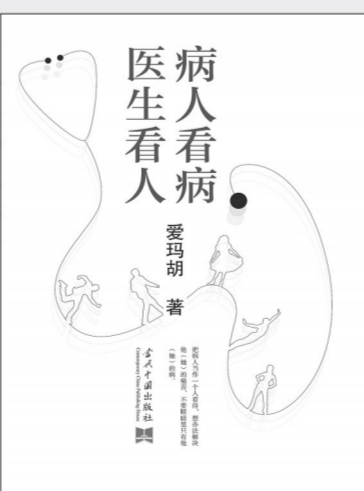
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，慈禧下发懿旨说，她在

垂帘听政时，“军机章京缮写妥速谨慎”，在举行归政典礼之际，应该给予奖叙。于是，顾璜升为四品衔户部郎中。光绪十七年考察官员时，顾璜被列为京察一等，奉旨记名以道府用。顾璜并未任地方官，而升为内阁侍读学士、太僕寺卿和通政使司的通政使。由于通政使的职务是政情通达，地位显赫。通政使和六部尚书、左都御史、大理寺卿并列“九卿”，参议大政。

顾璜是位孝子，他为照顾患肝病的父亲，辞去高官回汴养亲。那时，他已是二品衔的高官，依然兼任军机章京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，顾璜的门生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，在上海设立分会。顾璜是参与上海分会的24位人士中唯一的河南籍人士。成立强学会和戊戌变法期间，顾璜的门弟子纷纷来汴，与其商讨时政。光绪二十三年，顾璜应河南巡抚刘树堂之聘，任大梁书院院长。当时，顾璜联络数名达官捐银1200两，自捐300两，为大梁书院增购新书，又亲自编定《大梁书院藏书总目》。顾璜于1927年去世之后，其后代将他的部分诗作、信函、对家世的记述，以及为户部起草的文件等，分为三卷收入《顾渔溪先生遗集》。该书由顾璜的好友、原河南巡抚陈夔龙写序。

连载



病排除了，颈动脉好几个粥样硬化斑块，心电图有点小问题。造影可以不做，老人一听就毛了：他们都做就我例外，你歧视我吗？既然病人坚持，就安排做吧。

于是，某个星期二，我们科室的造影日，三位老人排队进了造影室。我没进导管室，就在办公室等消息。那两位先出来

了，一人安了一根支架，做得不错，精神抖擞着惦记老哥会安几根支架。

老人出来了，冠状动脉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事还真奇了，不说的，就他每天一碗油汪汪的红烧肉，脂肪在哪里？这只能说是先天体质了。

第二天查房，老人眼巴巴等我，问我为什么血管没问题。我也摇头，这哪里说得清楚，笑着说：“他俩不吃红烧肉，一人安了一根支架，你天天吃红烧肉，居然血管好好的。也许是红烧肉救了你呢？”大家都笑了。

老人满眼希望地望着我问：“那我还可以吃红烧肉吗？”

“呃……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一个问题。”

**老病号**  
她是老病号了。最初是她老伴生病，高血压和慢性气管炎，到我们医院住院，就认识了，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。慢慢地，爹爹的病越来越多，又发现了糖尿病、血吸虫肝硬化、消化道溃疡，肾

脏和心脏也不大好，还发作了一次中风，一年至少要到医院待大半年，有几年的春节都是在医院过的，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
那时她才五十出头，给爹爹请了陪护，每天来看看，送点油汪汪的红烧肉，脂肪在哪里？忙进忙出，问病情都是简短的，总是一句话，“哎呀，我总是把爹爹交给你们了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治，死了不找你们扯皮。”就着急走了。也不能怪她，老伴要照顾，家里的树林和鱼塘也要照应，里里外外就她一个人。问她孩子们呢？她就摆手。我们也不好多打听。

有好事的同村人悄悄告诉我，别看爹爹一副老实人模样，闷声不作气，年轻时吃喝嫖赌，从不管家，多亏她能干，种树苗、养鱼苗，赚了钱，才把五个儿子拉扯大，所以孩子们不愿意伺候爹爹，钱还是出，人不想管。所幸孩子都有出息，会挣钱。

和她搭伙做生意的男人喜欢她，要和她在一起，她说要给孩子留个爹，不同意。男人不

勉强，也不顾忌，还是一起做生意伙伴，一直这些年。

大约十年前，一次她来看爹爹时，突然发了心脏病，我们紧急处理后通知了子女，才第一次见到她的五个儿子。那时我们医院还不能做血管造影检查，建议转到心脏病医院治疗。果然孝顺是分人的，五个儿子对爹不闻不问，对她极为上心，二话不说，转了去，花了几万块，给她安了支架。回来千恩万谢我们，说要不是我们处理及时，老娘的命就没了。以后就一直在我们医院拿药吃，再也不让她做生意了。

有时爹爹发病来住院了，就给她也办个住院手续，两人住一间房，顺便疗养一下，五个儿子放下生意，每天轮流来看护，媳妇送饭，一日三餐。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样子。

这样又过了五六年，一次爹爹在家中突然消化道大出血，根本来不及送医院，就去了。不久，跟她搭伙做生意的男人也生病去世了。这些也都是同村的人讲给我们听的。